

N 本期聚焦

领会中央精神“不跑偏”是大学问

张国清

地方政府是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主要阵地，也是领会中央领导讲话、落实中央精神的落脚点。然而，部分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重要讲话、决定精神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和执行错误等现象，导致中央重大决定或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丧失效力，损害中央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形象，给地方政府工作造成负面的后果，影响了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造成地方政府对中央精神理解偏差的主要原因

第一，在中央部署统一性和地区发展不均衡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两点：其一，落实中央精神的内在要求与地方政府财力和行政能力不相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财力和人力支撑，但是从地方来说，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北部、中部贫困地区发展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部分发展落后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来执行中央精神，又不得不对其作出回应，所以，只能按照自己现有的经济水平和施行能力对中央精神作出解读，并提出执行方案。相对发达地区则会利用自己的区域优势和先发优势，对中央精神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向中央施加影响，使一些中央决议朝着更有利于自己所在地区发展的要求倾斜。其二，中央精神与地方目标和需求存在偏差。中央文件、领导讲话、会议精神等更多是全局眼光和全局战略，以平衡、统一方式

统筹部署，但是各个地区的发展目标和需求是不一致的。这使得各地在贯彻中央精神时所秉持的理念不一样。部分地方政府往往会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对中央精神做出相应改变，造成部分地方政府“跑偏”的客观现象。

第二，在中央精神执行的全面性和地方政府领导执政绩效的可预期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领会和执行中央精神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领导倾向于在短期内容易产生优良政绩的工作下功夫，将其作为自己施政的焦点和重点，针对不利于自己政绩的中央决策和决议、领导讲话、会议精神等，他们会选择性地理解和执行。他们往往不愿做“无效工作”或“低效劳动”。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领会和消化中央精神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现象。

第三，在中央决议和中央精神执行的客观要求和地方政府领导主观意愿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央决议或中央精神一般会有一些新的提法。新提法存在有待确定的解释空间，中央决议或中央精神在层层下达过程中，先从中央到省级，省级再结合实际下达到地市级，再下达到县级，这种自上而下的传递和解读过程，由于每一层级领导对中央精神和领导理念各有不同，对同一个中央决议、中央领导讲话或政治文件，不同层级的每一个领导者都会作出自己的主观解读，最终的施行结果可能偏离中央精神。

要改变对中央决议或中央精神进行过滤、筛选和处理的思考方式

地方政府要算各种不同的

“账”，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账。要改变有些地方领导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头脑中对中央决议或中央精神进行过滤、筛选和处理，只留下对自己有利有用的部分，剔除对自己不利无用的部分。

地方政府领导要以大局意识对待中央精神，加强自身理论学习，不断章取义，不穿凿附会，做到抓关键、求本质。中央会议和领导讲话不可能考虑到每个地方的每一个方面，学习者要灵活掌握中央会议和领导讲话，了解中央会议或领导讲话针对的具体问题和特定语境，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央会议精神，熟悉中央会议的具体内容。在原则上保持与中央会议精神高度一致，落实中央会议精神不打折扣。这是首要步骤，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此，学习态度要认真和真诚，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偏不倚、仔细研读、全面领会，从大局上考虑党中央提出该精神的目的、意图和条件，抓住核心思想、本质所在，理解中央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本地的关系，正确领会中央精神，在施政过程中把中央精神贯彻到实处。

地方要在中央的战略布局中把握发展的重大机遇

地方政府要结合实际，根据地方特殊情况，落实中央精神。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精神和地方发展目标中寻求平衡点，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把握发展的契机和机遇。地方要重视创新，主要是政府服务创新，更好地为发展地方社会、政

N 它山之石

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及启示

李 伦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给世界产业技术和分工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革命性影响。智能制造成为全球新一轮制造变革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纷纷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提质增效、由大变强的关键期，如何抓住智能制造这个核心，让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考量。

智能制造是全球工业化大势所趋

近年来，主要工业化国家将智能制造视为未来制造业的主导范式，制造业智能化是全球工业化的大势所趋。从战略演进和政策实践看，主要工业化国家发展智能制造的基本思路是立足本国的产业基础与传统优势，以解决本国产业升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导向，着力寻找制造业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结合点。一些国家在发展本国智能制造的同时，还积极将本国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向其他国家输出，力图在全球制造业智能化大潮中谋求一席之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和德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其一，美国发展智能制造的战略思路可以归纳为“信息先行、标准支撑”。美国发展智能制造的基本思路是要利用美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软件等基础产业的全球领先优势“反哺”制造业，发挥标准对信息有效流动和系统的快速响应应具有的重要作用，显著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从而在灵活性、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重塑美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在发展重点上，美国优先发展三项制造技术：尖端传感、控制与制造平台；可视化、信息学和数字制造技术；先进材料制造。其中，前两项技术重在提升企业对信息作出快速和高效响应的能力。

其二，德国“工业4.0”计划是其发展智能制造的总体战略。该计划立足于德国强大的复杂产品制造能力，这促成德国发展智能制造的基本思路是在制造业领域引入“物理—信息系统”：从建设“智能工厂”着手，出产可实时生成数据的“智能产品”，形成制造与产品的大数据系统。大数据经实时分析和数据归并后形成“智能数据”，再将“智能数据”进行可视化和交互式处理，实时向智能工厂反馈产品和工艺优化的方案，从而形成“智能工厂—智能产品—智能数据”的闭环，驱动生产系统智能化。

智能制造引领中国制造2025

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制造复杂产品的能力，而智能制造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高点，代表着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趋势，决定着—个国家制造复杂产品的能力大小。因此，智能制造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以智能制造引领“再工业化”战略，我国则将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

《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是智能制造。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研发出一批智能化产品；二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制造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使生产和管理过程实现智能化；三是微观的企业层面，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和共享，建立工业互联网或物联网。

面对当前全球智能制造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我国发展智能制造应该立足于本国优势与问题，可以参考但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我国发展智能制造最大的潜能，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智能解决方案的本土化需求。因此，应按照“适用的便是最好的”原则，勇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发展之路，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坚持远近结合、重点突破，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智能制造深入发展，真正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的产业生态体系和新型制造模式。

N 有此一说

推动城市治理升级为城市“智”理

秦 浩

城市治理能力是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数字城市、感知城市、无线城市、智慧城市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互联网+”正在付诸实践，这为解决城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提供了难得机遇。然而，“城市治理+互联网”仅是单纯技术层面的工具性应用，是城市治理的加法，从本质上看还是一种物理变化。要真正为城市治理提质增效，应催生“互联网+城市治理”的化学变化，即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化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城市治理体系，推动城市治理升级为城市“智”理，引领城镇化向更高阶段发展。

从封闭走向开放，提高信息整合共享能力

城市“智”理的根基是数据，核心是大数据。城市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运行数据，要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营，首要任务是将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海量、多样、异构的数据整合为大数据。在传统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下，不同职能部门的信息系统分散建设、互不兼容，严重阻碍了彼此间的信息整合与共享。

要破解信息孤岛难题，应实现由封闭型信息架构向开放协同型架构的根本性转变，具体分两步走：一是“聚”，通过物联网对城市数据进行全面采集与动态监控，再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一个能够汇聚数据资源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将原本条块割据的部门信息系统一律迁移到云平台，信息获取、加工和存储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二是



资料图片

“通”，借助云平台搭建的数据交换平台，建立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交易机制，打破行政界限和信息壁垒，实现政府数据公开的有序化。应该说，城市“智”理的每一个主体既是信息的创造者，也是信息的使用者。

从机械走向智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城市治理不能偏离民生“指南针”，互联网发展的核心也在于“用户思维”。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大多采用“一刀切”的机械方式，缺乏用户细分和个性化服务需求分析，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精准性与效率性不高。

城市“智”理对于公共服务品质的改善将从两个方面实现：在政府端，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整合公共资源部署到公共服务云，并按服务领域细分为医

疗云、社保云、社区云、就业云、教育云等若干微云。政府通过对云平台上的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度，例如，利用医疗云可以分析出城市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利用就业云可以掌握岗位供求趋势等；在用户端，线上线下相结合（O2O）的政务服务体系将让企业和市民享受到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移动APP的应用以及智能卡、智能终端、便民服务中心等服务渠道的延伸，使获取公共服务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一站式智慧便民服务将成为可能。

从粗放走向精细，提高城市运行管理能力

城市规模的增长和城市人口的膨胀往往产生交通拥堵、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虽然政府部门几乎穷尽各种方法治理“城市病”，但依然难以摆脱“头痛医头”的窘境。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提出的“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要求，大力推进网格化管理，对城市问题进行实时感知和智能响应，有望解决上述困境。

基于网格地图和地理编码技术的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市地域划分为网格状单元，并将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进行数字化展现，从而实现对城市管理对象精准定位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建成的“市—区—街道—社区—网格”五级管理服务网络，能够对路网通行、污染物排放、公共设施受损、违章建筑、占道经营等情况进行全时段监控和一体化响应。与以往“亡羊补牢”式的反馈控制不同，网格化管理是一种趋于前瞻性的快速控制机制，在事件发生的临界点之前就能及时捕捉到问题并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

从被动走向主动，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

近年来，城市突发事件呈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复杂态势，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与联动处置机制，应急管理的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城市应急“智”理的优势在于，能够将事后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预测预警，提升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行动能力。

城市应急“智”理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政府内部的智能应急指挥系统，系统的集成效应有助于打破不同应急主体的碎片化状态，优化应急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实现多部门协同应对的综合指挥调度和快速反应；二是政民交互的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该系统能够将市民上传的险情信息加以整合汇总，并同步将危险源排查信息、预警信息等向社会发布，从而提高危机防范和处置化解能力。

来源：学习时报

N 观点集粹

中华文化中的“道统”“学统”“政统”

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在《北京日报》刊文表示，任何民族的历史传统都包含着“道统”“学统”和“政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故国”，在几大古代文明相继凋零、中断的“常态”中，不仅独存而且历久弥新。

中国的“道统”，即中华文化主干中最为人们尊崇的信仰、伦理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魂。大略言之，这一“道统”，光舜肇其端，孔子定其型，孟荀张之大，至宋则二程、朱子、象山丰富之，最后集大成于王阳明。如果说“道统”是基因，“学统”则可以说是遗传的途径。“学统”为了维护道统，会

随着时代、地域的改变而演化。19世纪中叶，中华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经过一段艰苦探索，形成了由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一系列学界翘楚建构的“新学统”。

此外，还有一个“政统”，即政权延续、转换的脉络。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自古“政统”的变化竟无碍于上述二“统”的发展进步，即使华夏陆沉，“道统”“学统”依旧在，而经过痛苦的洗礼之后，还会焕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贯穿在中华民族“道统”和“学统”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民族的一定要和谐而一统，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构建特色小镇需实现平台化网络化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闵学勤在《新华日报》撰文提出，特色小镇理念为建设中国新型城市的美好未来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如何构建特色小镇的精准治理模式也将直接考量基层政府和民众的智慧。特色小镇从创建之初到日常运营需要一整套规范制度，精准治理嵌入到运行机制中体现的不再是条块分割，而是平台化、网络化的运行模式。

由于特色小镇体量较小，所有参与小镇运行的各主体可直接在镇管委会搭建的工作平台(包括线上和线下)中共享信息、回应需求、解决问题及互相补位等，运行一个周期后，平台上每个治理主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熟知多部门、精通多学科，特别要突显线上平台在特色小镇精准治理中的作用，才能随时高效应对来自多主体的声音。

供给与需求相分离不利于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

熊孟清、杨雪峰在《中国环境报》刊文说，目前广泛实行的政府购买与分配垃圾处理服务的垃圾处理组织形式，即垃圾处理企业只需要面向政府，完成政府送来的垃圾处理任务，达到政府规定的处理标准和向政府领取服务费(处理费)；而政府负责将垃圾分配给垃圾处理企业，实则是负责向垃圾处理服务的需求者分配垃圾处理服务，亦即垃圾处理服务的需求者(同时也是垃圾排放者)也只需要面向政府。这种供给与需求相分离的模式，致使垃圾处理失去了应有的经济活动和市场行为的要素，加深了垃圾处理似乎只是政府管理和社会公益活动的印象，不利于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

推动垃圾处理回归社会经济活动本色的途径，是建立健全市场导向型垃圾处理组织形式。市场导向型垃圾处理组织形式就是垃圾处理服务供给者与垃圾排放者(或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公司、社区(村)居委会等组织)以市场规律为导向进行直接交易，政府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对垃圾处理活动进行规范、调控与监督。这不仅仅是投融资模式和商业模式的调整，更是垃圾处理体制与机制的一次创新，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社会参与与的积极性，促进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保障垃圾处理企业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